



器官移植：阳光下生命的延续

本期嘉宾：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 黄洁夫

采访者：本报记者 许奉彦 裘佳

器官移植是集医学之大成的高精尖技术，对医疗机构和从业医生都要求极高。但长期以来，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为死囚器官，阻碍了相关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让从业医生承受医德底线的鞭笞，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自2015年1月1日中国的器官移植全面停止用死囚器官以来，器官移植走上了“阳光、透明、公开、公正”之路。8月22日，中国器官获取组织联盟大会暨国际器官捐献论坛在广州召开。黄洁夫强调，希望通过该次大会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与接受程度，提高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率，也让从业医生走出“灰色地带”，真正回归纯洁的救死扶伤。

器官捐献 让医生走出灰色地带

《医师报》：器官移植在我国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黄洁夫：器官来源曾让从业医生在国际上被“妖魔化”，器官捐献将让医生真正在阳光下行医。

20世纪90年代，器官移植技术在我国日趋成熟，涌现出了一批技术卓越的专家。作为我国著名的肝移植专家，黄洁夫是器官移植的大力呼吁与推进者，也让他成为国际上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代表性人物。黄洁夫认为，器官供体来自死囚，是中国器官移植界在国际领域长期沉默的禁区，也是医生们用手术刀创造生命奇迹下的阴影和“不能说的秘密”。

这直接导致我国器官移植系统建设的滞后，也让医学界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境地。

国际上对我国的器官移植医生采用了“三不”原则，即“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不能够、不允许参加世界的器官移植组织；中国有关器官移植的文章，包括临床在内，在所有国际著名杂志一律不准发表；中国的学者不能在世界舞台上阐述、演讲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成绩。”黄

洁夫说，这在当今科技全球化时代，对学者来讲，这是非常尴尬的遏制移植医学发展的政策。

“几乎所有的器官移植医生对此都很无奈。”黄洁夫说，一方面医生技术精湛，有能力、有责任挽救患者的生命，而另一方面，器官的来源又让医生觉得有违医德却无可奈何。黄洁夫回忆，裘法祖院士在去世前一周曾打电话给他，表示希望能够

通过他来改变用死囚器官的现状，让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能够光明正大的使用自愿捐献器官。2015年1月1日，中国的器官移植全面停止用死囚器官，黄洁夫认为，这对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契机，同时对这对医学界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标志着器官移植医生们从此摆脱了道德上的拷问，真正走到阳光下行医。

全社会联动 让器官移植“阳光化”

《医师报》：您对器官捐献有何展望？

黄洁夫：国家政策、媒体、医疗机构、公益组织等各方联动、加强监管，让器官移植真正“阳光化”。

多年来，黄洁夫致力于器官移植“阳光化”的工作，在各方努力下，平台已搭建，数据也证明器官捐献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黄洁夫认为，“还远远不够”。“全社会动员，让公民对器官捐献有新的了解和认识是一方面，”黄洁夫说，另一个层面则是医院重症ICU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真正的器官捐献发生在ICU，我国每年在ICU死亡的患者有600万，如有千分之一实现器官捐献，就能让现在的移植数量翻番。”

黄洁夫说，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体系设计体系包括从人体器官的捐献、获取、分配，直到移植后的登记和监管，卫生行政部门、红十字会、社团组织和医院等多方共同参与，以保证器官捐献与分配的公平、透明。“目前已经形成全社会响应的局面，”黄洁夫说，器官捐献呈井喷式上升说明公众的支持在大幅提升，但这个体系仍然十分脆弱，需要全社会、媒体甚至是司法机构的关注、参与和监管。

“事实证明，器官移植的落后不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移植医疗管理的行政体系的不完善。”黄洁夫说，公开、透明、可溯源的阳光体系建立，必将打破器官移植产业链，让器官移植、参与器官移植的医务工作者真正走在阳光下。“一个良性循环，没有缺口的体系建立，对于参与器官移植的各方来讲，都是神圣的使命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黄洁夫深信不疑。

器官捐献方兴未艾 尚为八个月的婴儿

《医师报》：我国器官捐献目前的发展情况如何？

黄洁夫：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希望在全社会的支持下，逐步成长。

2010年，我国的人体器官分配和共享系统开始运行，5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透明阳光的公民资源捐献大气候已成，”黄洁夫说，2010-2013年，公民身后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为1448例。2014年全面推广公民捐献，1年就实现了八成的器官来自公民捐献。截至2015

年8月19日，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数量已增至4347例，我国公民共捐献大器官12478个，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达到1.84，目前中国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已处于亚洲国家首位。黄洁夫预测，随着器官捐献的公众教育的普及，捐献体系的完善和相关政策的出台，2016年公民捐献器官

将可能实现成倍增长，我国在器官捐献在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的道路上可以大踏步发展。

黄洁夫对我国器官移植捐献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2015年才切断原来老的系统，捐献事业相当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到如今才刚刚

八个月。黄洁夫说，八个月的孩子必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现在问孩子以后能不能踢球，能不能参加奥运会都为时尚早。”黄洁夫说，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共同帮助器官捐献从新生儿成长为成年人，而那时我们的目标和期望才是参加奥运会，并且拿到金牌。

可供移植的器官缺口大 有经验的移植医生尚少

《医师报》：器官捐献将对医疗界有哪些影响？

黄洁夫：随着捐献的增多，有资质能力的器官移植医生缺口加大，希望器官捐献的发展可以带动移植医学的发展，并让更多医生加入到器官移植的队伍中来。

器官移植手术需要医生具有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仁慈的道德水平要运用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支持设备，正是如此，对从业医生要求更高，培养难度极大。同时，目前我国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约为30万，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为1万多例，

“可供移植的器官缺口大，医生也十分紧缺。”黄洁夫说。

“比如，能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有经验的专家不足百人。”黄洁夫说，目前，我国仅有169家医院可以开展器官移植，而相比只有3亿人口美国，其却有320多家医院可开展器官移植，

其中高水平的从业医生超过千人。黄洁夫认为，随着全民器官捐献认识度的普遍提升，以及器官供应链的建立与完善，经验丰富的医生缺口问题必将凸显。

黄洁夫为我国器官移植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得到了从业

人员的大力支持。黄洁夫认为，器官捐献工作正走上正轨，越来越多的公民了解了器官捐献，相关行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医学的进步，公开透明的环境能够让医学界摆脱尴尬地位，必然吸引更多医生加入到器官移植的行列中来。

对话 高端